

# 郑和下西洋与明朝对东南亚的 睦邻安邻政策

Zheng He's Expeditions and the Ming Policy of  
Good Neighbourly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梁立基  
(LIANG Liji)

## 摘要

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 - 东南亚关系史上的新纪元。明朝以“和为贵”的睦邻安邻政策在东南亚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出现了“辑睦邻国, 无相侵越”的安宁局面。然而为什么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和成功的对外政策却没能使中国真正走向海洋, 走向世界,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从内源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封建主义王朝, 其经济仍停留在自然经济的状态, 所以一个世纪以后便被西方资本主义所超越而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政府对东盟国家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 这正是总结了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把睦邻安邻政策建立在世界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 通过富邻政策达到共同繁荣和进步, 使“共享太平之福”得以真正实现。

## Abstract

Zheng He's voyages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outheast Asia

---

梁立基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原印尼 - 马来文化研究所所长、东南亚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E-mail: ljliang@pku.edu.cn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05

relations. The Ming policy of emphasiz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was put into practice to produce an environment of peace and mutual non-aggression. However, that China w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aritime power then and scoring foreign policy successes had not enabled it to adopt a maritime policy and to open up to the world. This was because the Ming dynasty was an inward-looking feudal state ruling over a stagnant economy. A century later, China was overtaken by Western capitalism to become an economic laggard.

In the current age of "globalization", Zheng He's peaceful expedition has inspired China to adopt a good neighbourliness policy of respect, peace and prosperit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By building this policy o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through a "prosper thy neighbour" policy, China will help to promote mutual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in an atmospher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东南亚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地，也是郑和积极贯彻明朝睦邻安邻政策最为成功的地区。郑和的到来处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酋酋长争相迎”（马欢 1451：《纪行诗》页 1），因为他给东南亚带来的是友谊、和平与安宁。至今在东南亚仍可以看到和听到郑和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历史佳话和动人传说。世世代代的东南亚人民一直在怀念和歌颂郑和的伟大历史功绩，他可以说是开创中国 - 东南亚睦邻安邻关系的历史功臣。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评析郑和下西洋整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明以前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开通中国 - 东南亚 - 南亚的航道，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经越南、泰国、缅甸至斯里兰卡，回程时经马六甲海峡，绕马来半岛，过越南平山，回到日南郡的象林界，往返费时约两年。当时就已经有了海上贸易，朱杰勤教授说：“中国同印度及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始于汉初，大致在公元前，中国航海船舶已知使用风帆行驶大海上”（朱杰勤 1984：35）。范晔撰写的《后汉书》则第一次记载中国与爪哇的叶调国（Javadvipa）建立了正式关系：“顺帝永建六年（公元 131 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后汉书》，卷 6）。从印度尼西亚



亚的考古发掘中也可以证明汉初中国与东南亚已经有了联系。1936年荷兰考古学家海涅·赫尔德恩在苏门答腊岛发现史前石刻，与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之墓前石刻多有相似之处；后来在中西部海岸的古冢里又发现一陶器刻有“初元四年”的字样，说明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在印度尼西亚可能已经有中国人的踪迹了。

中国派使者访问东南亚大概始于三国时期。地处江南的吴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发展自己的经济，特派朱应和康泰去东南亚诸国进行亲善访问。朱应所作《扶南异国志》和康泰所作《吴时外国传》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介绍有关东南亚国情的历史文献，可惜原书已佚，但其所记仍可散见于《隋书》、《唐书》、《太平御览》等史书。有关的记载虽然有限，但从中国使者所受到的欢迎情况大致可以看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在当时已经存在一种相当友好的关系。

中国与东南亚比较广泛的联系与交流是在唐宋时期。7世纪唐朝与室利佛逝王朝开始发展文化交流，其开拓者是著名的唐高僧义净。他把当时东南亚佛教文化中心的室利佛逝看作是研究佛学的理想基地，在那里先后住了十多年从事佛教的研究和翻译。他除了招来一些唐朝僧人一起工作，还建议那些想去印度取经的唐高僧最好先在室利佛逝进修，他说：“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由于文化交流的需要，义净已意识到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重要性，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到中国人学习掌握东南亚语言的人。他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提到了几个僧人的名字如运期、大津、孟固等“善昆仑语”或“解昆仑语”。他说的“昆仑语”就是指当时流行于室利佛逝的“古马来语”。到了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比较侧重于贸易方面。到东南亚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日益增多，他们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宋史》也记载中国商人受到礼遇的情况：“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宋史》：14091）。同样，到中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贡使和私商也相当活跃。这里可以举出一个典型实例：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一位叫地华伽罗的三佛齐地方大首领为了搞好与宋朝政府的关系，以利发展与中

国的贸易，愿出巨资重修广州被毁的天庆观。此举深得宋帝的赞赏，后来封他为“保顺慕化大将军”，从此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贸易来往更加频繁（详见《广州旧志》和《广州重修天庆观记》的记载）。

由上可知，自汉至唐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直是在和平、友好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未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尽管当时各朝廷还没有定出明确的对外政策，但中国“和为贵”的传统哲学思想始终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只有在元代，这个“和为贵”的传统哲学思想才遭到破坏。众所周知，蒙元的统治者是靠武力征服而得天下的。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以其使者遭黔面之辱为由曾派两万多人的军队远征爪哇兴师问罪。这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史上是唯一的一次用兵，可以说完全是个例外。明朝建立之后，中国又恢复了“和为贵”的传统哲学思想，重新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睦邻友好关系。

## 明初郑和下西洋积极推行睦邻安邻政策

蒙元入主一个多世纪，穷兵黩武，战乱不止，致使民生凋敝，在对外关系上则破坏了“和为贵”的传统哲学思想，到处武力征伐，使中外关系受挫。朱元璋靠农民起义推翻蒙元而建立明王朝之后，恢复了汉人的统治。在百废待兴之时，为了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明太祖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治国方针，同时又把“和为贵”作为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派沈秩出使渤泥（文莱）国时就向国王明确表示：“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番，一视无外耳”（宋濂《宋学士文集》，卷55）。这就是说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对他国只求睦邻，建立和平的宗蕃关系，绝无领土野心。第二年明太祖又郑重宣布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外不用武力相威胁，他说：“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以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明洪武实录》，卷68）。明太祖照会安南国王时又说：“中国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强无知者必征。今朕统



天下，惟愿民安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张燮 1617）。明太祖还告诫子孙说：“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皇明祖训》，祖训首章）。明太祖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方与远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明洪武实录》，卷 34）。当然，作为封建帝王明太祖在对外关系上仍没有摆脱“天朝上国”和“唯我独尊”的宗蕃观念。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明朝与诸国的“宗蕃”关系和后来西方殖民主义的“宗属”关系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明朝政府完全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各国仍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互不侵犯。《明史》礼志记载，“明祖既定天下，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或降香巾以祀其国之山川，抚柔之意甚厚，而不伤国体，视前代为得。”可见明朝政府对外毫无殖民扩张之野心，始终以“和为贵”的思想来指导睦邻安邻的“宗蕃关系”。

明成祖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明太祖的睦邻安邻政策，一方面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帝位，遣使持“即位诏”宣喻各国，以正视听，树立自己的国际威望；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休养生息”，发展经济，争取有个和平友好的周边环境。永乐七年（1409 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所持敕书中有云：

朕奉命君主天下，一休上帝元心，施恩布德，凡复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虏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之。（李士厚 1937）

这更清楚地说明了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完成“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使命，进一步贯彻明朝政府所奉行的“和为贵”对外方针，正如巩珍所言，是“扩往圣之鸿规”（巩珍《西洋番国志·序》），以巩固和发展睦邻安邻的“宗蕃关系”。

当年郑和下西洋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据云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就不下六十二艘，能容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然而如此强大的海上力量却从未用来侵占他国一寸领土或掠夺他人一草一木，

相反却用来传播友谊和维护地区和平，这在东南亚体现得尤为突出。《通番事迹记》中写道：

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国城、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漠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巩珍《西洋番国志·序》)

这三十余国中至少有十三个国家是在东南亚。当时东南亚的局势不大稳定，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和武力冲突时有发生，海上交通也因海盗猖獗而常受阻。因此，郑和访东南亚的使命除“宣示德威及招徕之意”，促进与各国建立睦邻关系外，还努力贯彻安邻政策，维护正义，反对以强凌弱，促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同时还大力肃清猖獗的海盗，扫除海上交通的障碍，以确保朝贡贸易的畅通和遣华使臣的安全。由于郑和出使西洋所作外交努力的成功，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来华访问的东南亚各国国王和使臣络绎不绝。下面就拿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迹来说明当时中国 - 东南亚睦邻安邻关系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 郑和下西洋开创中国 - 东南亚友好关系新局面

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 - 东南亚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辑睦邻国，无相侵越”的大好局面。下面根据史书所记，我们从四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明初以“和为贵”作为指导思想的睦邻政策大见成效。东南亚国家纷纷遣使入朝，好些国家的国王甚至亲自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华，以便同明朝建立正式的友好睦邻关系。第一位来华的是渤泥（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于永乐六年（1408年）八月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凡百五十余人来朝，受到明成祖高规格的接待。《明史》里这样记载：

六年八月入都朝见，帝奖劳之。……帝乃飧王于奉天门，妃以下飧于他所，礼讫送归会同馆。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寻赐王仪仗、交椅、银器、伞扇、锁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



绫绢衣十袭，余赐赉有差。（《明史》，卷 325，列传 213，外国 6）

明成祖非常赞赏渤泥国王，他说：“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夷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同上）。又说：“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同上）。为了表达对渤泥国王的深厚情谊和对两国永远相好的愿望，明成祖特赐封渤泥国中之山为长宁镇国之山，赐文刻石，系之诗曰：

炎海之墟，渤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违。  
 悽悽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迺来奔赴。  
 同其妇子，兄弟陪臣。稽桑阙下，有言以陈。  
 谓君犹天，遣以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  
 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樯，实劳恳勤。  
 稽古远臣，顺来怒赴。以躬或难，矧曰家室。  
 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蕃长，畴与王贤。  
 矗矗高山，以镇王国。饬文以石，懋昭王德。  
 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同上）

一月之后，渤泥国王不幸病逝，临终前给王后留下遗言“死后体魄托葬中华”，并嘱咐王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明成祖对国王之死非常哀痛，《明史》记载：

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缯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具棺客槨、明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岗，树碑神道。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顺。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同上）

如今座落在南京雨花台石子岗的渤泥国王陵墓经历了600年的风雨沧桑仍基本完好，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使这个明朝时期中国 - 文莱两国亲密友好的历史见证能世代相传下去。

接着来朝的是满刺加（马六甲）国王拜里迷苏刺。15世纪初在马来半岛南边的马六甲新崛起一个马来大王朝，明史称之为满刺加国。起初它北受暹罗威胁，南遭爪哇麻若巴歇（满者伯夷）压迫，急与明朝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稳定。永乐三年满刺加国王遣使人朝贡方物，并表示“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同上），也就是说要求明朝政府正式承认满刺加国王。明成祖立即答应，令制碑文，勒其山，末缀以诗文，表达对两国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诗曰：

西南诸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  
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  
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此民俗雍。  
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  
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袞礼虔恭。  
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  
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  
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同上）

满刺加第一代国王拜里迷苏刺为了更进一步密切与明朝的睦邻关系，于1411年亲自率领明史上可能是最庞大的代表团访华，共540余人，也受到明成祖最高规格的接待。《明史》里这样记载：

（永乐）五年九月遣使入贡。明年，郑和使其国，旋入贡。九年，其王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抵近郊，命中官海涛、礼部郎中黄裳等宴劳，有司供张会同馆。入朝奉天殿，帝亲宴之，妃以下宴他所。光禄日致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金银器、帷幔衾绸悉具，妃以下皆有赐。（同上）

满刺加国王在中国停留两个来月，明成祖与他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当满刺加国王要回国时，明成祖依依不舍地说：“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



留，但国人在望，宜望慰之。今天气尚寒，顺风帆去，实为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副朕眷念之怀”（《殊域周咨录》，卷8满刺加）。《明史》里也记载明成祖的送别规格特高：

将归，赐王玉带、仪仗、鞍马、赐妃冠服。濒行，赐宴奉天门。再赐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白、钞四十万贯、钱二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帛千匹。浑金文绮二、金织通袖膝襴二；妃及子侄陪臣以下，宴赐有差。礼官饯于龙江驿，复赐宴龙潭驿。（《明史》，卷325）

这都充分地表明了明帝对满刺加王的深情厚谊。在郑和下西洋期间，前后有三位满刺加国王亲自访华，共六人次。

据史书记载，后来从东南亚来朝的还有菲律宾的苏禄国王和古麻刺朗之国王，也受到同样规格的接待。有关苏禄国王的来朝，史书是这样记载：“永乐十五年（1417年）其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刺，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刺卜，并率其家属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浮海朝贡，进金缕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礼之若满刺加”（《郑和遗事汇编》，第6章）。在京二十七日后，三王辞归，东王到达德州时不幸病逝。噩耗传来，明成祖不胜痛悼，立即遣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德州致祭，并以王礼厚葬之，还亲自撰碑文，赞扬东王聪慧明达，赋性温厚，为发展与明朝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也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功绩，前来德州王墓凭吊洒扫的人没有间断过。明末顾炎武还写了一首题为《过苏禄国王墓》的诗，其中有“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的诗句。

古麻刺朗之国王干刺义亦敦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来朝时也受到与苏禄国王同等规格的接待。后来国王病逝于福州，明帝也以王礼厚葬于闽县，令有司岁致祭。

以上所列史实可以说最具代表性，从所引的两首颂诗中也可以看出明朝与东南亚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期间来朝的使者络绎不绝，据史书记载，永乐九年（1411年）在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回国后，继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来朝的还有“古里国王沙米的、柯枝国王可亦里、苏门答腊国王宰奴

里阿必丁、阿鲁国王速鲁唐忽先、彭亨国王巴刺密锁刺达罗息泥、急兰丹国王麻哈喇查若马儿、南巫里国王及加异勒头目葛卜者麻、爪哇国新庄村主八弟的蛮，各遣人奉表贡方物”（《永乐实录》，卷 77）。《明史》中说，“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庭”（《明史》，卷 326，外国 7），宫廷宴会上时时响起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明史》，卷 63，《乐三》）。后来据记载，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后的第一年（1423 年）至京贡方物的十六国使者多达千二百人，真可谓盛况空前。

其次，明朝主张的安邻政策也取得实效，使东南亚各国的矛盾冲突能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例如渤泥国素属阉婆（爪哇国），每年岁供负担很重，经明帝调解，爪哇国终于同意免其岁供。又如真腊数被占城侵扰，明帝出面“敕占城王罢兵修好”（《明史》，卷 325，外国 5），二者终于实现了和解。最能体现明朝安邻政策成功的是下面的实例。当满刺加国受到暹罗入侵的威胁时，国王立即向明廷求助，而明成祖也立即遣使谕暹罗国王，晓以大义，指出“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要求“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太宗实录》，卷 217）。在明廷的调解下，两国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在国势强盛的时候，明朝一直扮演着强有力的和平正义维护者的角色，使东南亚局势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但到了明朝衰落后，那种睦邻安邻关系就很难维持下去了。当 16 世纪初西方的佛朗机（葡萄牙）率先侵占马六甲时，明世宗已经难有作为，当时兵部议：“请敕责佛朗机，令归满刺加之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世宗实录》，卷 4）。显然，明廷已经无力直接维护和平与正义，只能从道义上表示声援而已。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 - 东南亚睦邻安邻关系的辉煌历史也进入了尾声。

第三，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开展了广泛的人员和文化交流，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郑和每次下西洋都有上百艘的舰船和近三万名的人员，所到之处必然要和当地的社会进行接触，开展人员和文化的交流。而在东南亚这种交流就更为频繁和广泛了，因为那里是郑和船队去的次数最多和停留的时间最长的地区。这里不妨拿两处著名的郑和历史遗迹



作为例证，一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一是印度尼西亚的三宝瓏。

郑和下西洋率领如此庞大船队出国远航，必然需要有一个地理位置合适和安全可靠的后勤基地，而马六甲正是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首先是战略位置，马六甲正好地处东西洋的必经通道。其次它是明朝最友好的国家，安全和供应都能得到保证。所以满刺加国成了郑和五次出航和归航的首选后勤基地乃理所当然。马欢这样描述：“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廩。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马欢 1451）。可见马六甲对郑和船队的重要性，每当出航和归航时在那里集聚的中国人有好几万，他们与马六甲人民交往甚密，相处融洽，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件，这在马欢、巩珍等所写的见闻纪实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在马六甲至今仍保留着不少有关郑和的历史遗迹，如三宝城、三宝山、三宝亭、三宝井等。至于有关郑和的历史佳话和传说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同样，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宝瓏也有遐迹闻名的郑和历史遗迹三宝庙。而这个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和印度尼西亚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产物，也是中国儒释道和伊斯兰教相共处的具体象征。据传有一次郑和船队路经三宝瓏时其领航员王景弘病重，郑和将他安置在附近的一个洞穴（后人称之为三宝洞）里养病，后来便留下在那里定居和繁衍后代。为了纪念郑和的伟大功绩，在那里兴建了三宝庙。长期以来三宝庙香火极盛，前往朝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既有华人，也有原住民。三宝瓏的三宝庙可以说是中国-印尼文化交流和华人-原住民亲密相处的历史见证。

郑和等人每到一国都要对该国的国情民俗进行深入的考察，特别是马欢所作的考察可谓细致入微且抓住典型。例如他在《瀛涯胜览》一书中对爪哇民族特性的描述就非常生动准确：“男子腰间插不刺头（beladau，一种短刀-引者）一把，三岁小孩至百岁老人皆有此刀。……国人男妇皆惜其头，若人以手触摸其头，或买卖之际钱物不明，或酒醉颠狂，言语争竞，便拔此刀刺之”（马欢 1451）。爪哇民族这种刚烈直率的性格至今还能看到。另外，对爪哇民族的能歌善舞和民间丰富的文娱生活书中也有绘

声绘色的描述：

每月至十五十六夜，月圆清明之夜，番妇二十余人或三十余人聚集成队。一妇为首，以臂膊递相联绾不断，于月下徐步而行。为首者口唱番歌一句，众皆齐声和之。到亲戚富贵之家门首，则赠以铜钱等物，名为步月行乐而已。有一等人以纸画人物鸟兽鹰虫之类，如手卷样，以三尺高二木为画干，止齐一头，其人蟠膝坐于地，以图画立地，每展出一段，朝前番语高声解说此段来历，众人围坐而听之，或笑或哭，便如说平话一般。（同上）

爪哇民族这种能歌善舞的天性和丰富多彩的民间曲艺一直延续至今。还有一点还需要提到的是，马欢对当地华人的情况和所作出的贡献也十分关注。他在书中写了他在爪哇国了解到的情况：“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曰格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还提到“中国历代铜钱通行使用”（同上）。马欢当时已看到华人在当地的创居，不仅使荒滩变成了新村，且为繁荣当地的经济和贸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郑和下西洋时期马欢、费信、巩珍、张燮等所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东西洋考》等都有关于东南亚人文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调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这比西方学者所做的要早一个多世纪。

在发展中国 - 东南亚睦邻关系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伊斯兰教。十五世纪初伊斯兰教已经传遍西洋，从西亚传到南亚和东南亚。在东南亚的马来群岛地区（今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已占主导地位。我想这也是明成祖之所以派郑和、马欢、巩珍等出身回族的伊斯兰教徒出使西洋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东南亚那些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特别看重郑和在弘扬伊斯兰教和促进华人穆斯林社区发展所起的作用。印度尼西亚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哈姆卡指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哈姆卡 1961）。而郑



和方面也对当地的伊斯兰教和华人从教的情况十分关注，马欢在《瀛崖胜览》中提到满刺加“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指出爪哇国有从广东漳泉来定居的华人“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郑和在东南亚穆斯林的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为了颂扬他的历史功绩，2003年5月29日一个崭新的座落在泗水市的郑和清真寺宣告落成。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郑和命名的清真寺，华人更是引以为豪。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学者潘仲元说：“郑和的辉煌功绩，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整个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光荣和榜样！”（潘仲元1989）

郑和下西洋时期，由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迅速发展和人员的交往日益频繁，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有鉴于此，明朝政府便于1405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外语学院叫“四译馆”（也称四夷馆），专门培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的外语人才，所设外语中有满刺加国语（即马来语）、暹罗语（即泰语）、缅甸语等。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在后来立的馆碑上刻有这样一句话：“译习之学可数（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重修翰林院四译馆碑记》）。可见明廷对外语的重要性予以高度的重视。就在此时，一批汉外词典也相继问世。其中的《满刺加国译语》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汉语马来语词典，要比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毕卡费达编的《意大利语马来语小词典》早出一个多世纪，且所收的词条数量更多。《满刺加国译语》内分十七个门类，所收之词多与航海和朝贡活动有关，是为满足郑和下西洋时期朝廷交往的需要而编写的。我们说，当一个民族认为有必要掌握另一民族的语言并且编出有关的语言工具书时，这就标志着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至于需要语言出来发挥互相沟通、加深理解和促进交流的作用。语言不仅是文化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后来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朝贡贸易的发展，东南亚国家纷纷以朝贡名义来中国互市通商。但应该指出的是，朝贡贸易并非商品经济的自由贸易，而是朝廷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来“贸采琛异”，以满足宫廷帝王和贵族官僚对玩赏物和奢侈品的享受需求，而民间贸易则仍受到严格的限制。明

廷甚至还实行海禁，“惟不通商，而止通贡”（《续文献通考》，卷53），因此当时没有可能进行大宗货物的进出口贸易，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明廷还实行“厚往薄来”的原则：“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明洪武实录》，卷154），“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这种赔本买卖显然与市场经济原则相违背，到后来便难以为继了，明廷不得不对朝贡的次数加以限制。因此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外贸范围，是为明朝开辟财源，此说似乎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应该说，恰恰就在这一点上，由于没有为明朝扩大外贸和开辟财源，促使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郑和下西洋所创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最终没能使中国真正走向海洋和走向世界，错过了一次大好的历史机遇。

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睦邻安邻关系在东南亚的经典著作中也有生动的反映，特别是满刺加与明朝的关系在马来经典名著如《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Hikayat Hang Tuah*（《汉·都亚传》）等都有专章专节加以生动细致的描述。尽管其中多带有传奇和传说的成分，但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反映了两国之间确实存在非常亲密友好的关系和有过大规模的高层人员交往这一基本历史事实，而且被马来民族一直视为正史或历史佳话而流传至今。

## 从历史反思中展望中国 - 东南亚关系的光明前景

今天在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作一次历史的回顾和反思。郑和下西洋时期开创了中国 - 东南亚睦邻安邻关系的盛世，但为什么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呢？为什么郑和之后再无后继者，中国又缩回大陆而闭关自守呢？我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封建主义国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还没有出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那个时期，封建专制及其意识形态仍然处于支配一切的主导地位，因此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只能被定格在



“宣德化而柔远人”，以求在“天朝上国”封建君主的领导下，通过朝贡贸易体制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宗蕃关系，“以共享太平之福”。而所谓的朝贡贸易并不是为了开拓世界市场，以促进国内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这和一个世纪以后刚迈入资本主义门槛的西方国家的海洋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国家走向海洋是为了满足国内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开辟世界市场的需要，因此从一开始就带有殖民掠夺性。16世纪起西方的殖民入侵很快就打破了中国与东南亚和平安定的宗蕃关系，从此东南亚便逐步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而中国后来也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三百多年来的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使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苦难，直到二次大战后才相继获得独立和解放，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已经过去六百年，如今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了。中国-东南亚关系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好好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再也不能放过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在继续贯彻“和为贵”的传统哲学思想、大力发展与东南亚的睦邻安邻关系的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为此2003年10月8日中国温家宝总理在印度尼西亚峇厘岛召开的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庄重地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主张。“睦邻”就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传统哲学思想，在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原则下共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架构。“安邻”就是积极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为共同的发展营造和平安定的地区环境。这二者可以说是郑和下西洋时期以“和为贵”的对外睦邻安邻政策在全球化时代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后一者的“富邻”则克服了郑和下西洋时期在经济政策上的致命弱点，把“和为贵”的理念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世界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通过各国间经济上的互利合作，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实现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这样就把“睦邻”和“安邻”关系建立在扎实的现代经济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之上，使“共享太平之福”的理想得以真正实现。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已经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联合宣言》，这是中国第一次与一个地区组织签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文件，是中国 - 东南亚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中国是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东盟十国的总人口也达 5.5 亿人。如今中国与东盟已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率先作为非东盟国家而加入，这将增进双方的互相信任，并加强双方友好合作的政治法律基础。中国和东盟还共同规划了具体目标，2005 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将实现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2004 年已提前实现了），另外还要加快谈判，如期建立“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政府提出的“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无疑将大大推动上述的发展势头。我们可以预见，随着 2010 年东盟和中国联合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拥有近 20 亿人口的最大市场，GDP 将达 2 万亿美元，贸易额达 1.2 万亿美元，这是何等令人鼓舞的前景。15 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期所开创的中国 - 东南亚友好关系，在 600 年后将再度创造辉煌，而且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将大大超过历史上的极限。

## 参考书目

《重修翰林院四译馆碑记》。

巩珍。《西洋番国志·序》。

哈姆卡 1961。〈郑和〉。收于印尼《星星》周刊，3 月 8 日。

《后汉书》。范晔，卷 6。《帝纪》《顺帝》条。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李士厚 1937。《郑和家谱考释》。昆明：正中书局。

马欢著，冯承钧校注 1955。《瀛涯胜览》（原著 1451 年成书）。上海：中华书局。

《明洪武实录》。

《明史》。

潘仲元 1989。〈举世闻名的航海家，乘风破浪七下西洋 -- 郑和是穆斯林的好榜样〉。

收于南京《郑和研究》9。

《世宗实录》卷 4。

《殊域周咨录》卷 8。

宋濂。〈勃尼国入贡记〉。《宋学士文集》卷 55。



《宋史》卷 489, 《外国列传》, 《閩婆国》条。

《太宗实录》卷 217。

《续文献通考》卷 53。

义净 1937。〈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藏要》第三辑。南京:支那内书院。

《永乐实录》卷 77。

张燮, 谢方校注 2000。《东西洋考》卷 10 (原著 1617 年成书)。中华书局。

《郑和遗事汇编》第 6 章, 诸国朝贡之事略。

朱杰勤 1984。〈中国古代海舶杂谈〉。《中外关系史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